□全球化与法律治理

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

——兼与赖昌星案比较

张 磊

[摘要] 虽然在加拿大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但是高山最终是被“劝返”回国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出逃时的身份、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以及回国的方式都不相同。从高山案反思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可以看到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正日趋完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领域。

[关键词] 高山案；非法移民遣返；劝返；赖昌星案；境外追逃

[基金项目] 北京市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YETP0293）

[收稿日期] 2013-10-20

[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875）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多次提倡反腐倡廉，要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从而逐步掀起了新的反腐高潮。境外追逃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开展，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引渡实践中“条约前置主义”等原则的限制，我们无法同尚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西方发达国家顺利开展引渡合作，影响了境外追逃的效果。所以，我们亟须开拓境外追逃工作的新渠道。本文将高山案为切入点，分析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与赖昌星案的暗合与差异，总结我国境外追逃的经验、教训，以期促进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开展。由于本文着重研究中、加两国围绕高山案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相关问题，所以本文所讨论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严格来说是指“高山劝返案”和“赖昌星遣返案”，而不过多涉及两人在国内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

一、非法移民遣返与劝返

高山，原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在伙同商人李东哲骗取客户巨额存款后，于2004年12月30日出逃到加拿大。2012年8月，经过中、加双方的共同努力，高山回国自首。2013年9月30日，中国银行“高山案”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至此，舆论关注多年的“高山案”主要犯罪嫌疑人都已经到案，开始接受法律的审判。高山回国自首，是中、加双方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结果。在传统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引渡是追回逃往他国的犯罪

嫌疑人或者已判刑人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受到互惠原则、条约前置主义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引渡合作往往不能顺利实现。由此,就出现了引渡的替代措施——“在无法诉诸正式的引渡程序或者引渡遇到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的情况下所使用的手段”^{[1]119}。从外延来说,引渡的替代措施分为常规替代措施和非常规替代措施,前者主要包括移民法的替代措施、刑事法的替代措施和劝返,后者主要包括“诱骗”和“绑架”。

高山案中所涉及的主要措施是移民法的替代措施和劝返。移民法的替代措施也被称为非法移民遣返,是指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入境者遣送回国,是遣返国为维护本国安全和秩序而单方面做出的决定。非法移民遣返在客观上造成了与引渡相同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也被称为“事实引渡”^{[2]179-180}。劝返,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无法诉诸正式的引渡程序或引渡遇到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的情况下,根据国家的授意或在国家的许可下,采取对外逃分子进行说服教育的方式,使其主动回到追逃国,接受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3]加拿大在引渡问题上奉行“条约前置主义”原则。该国1877年《引渡法》规定“只能向与加拿大签订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提供引渡合作。”而1999年加拿大新《引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该法第2条规定“‘引渡协定’是指包含引渡人规定且以加拿大为一方当事人的已生效协议,特定协议除外”。此规定扩大了作为引渡前置条件的“条约”的范围,将多边国际公约包括进来。其次,该法第10条规定“经司法部长的同意,外交部长可以与有关国家或者实体为执行引渡请求而就某个具体的案件达成‘特定协议’”。此规定突破了条约“前置”的条件,允许根据外交部与请求国就个案达成的“特定协议”开展引渡合作。由此看来,根据1999年加拿大《引渡法》,中加双方如果启动引渡程序,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二、高山案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

在潜逃之前,高山已经在为全家移民加拿大做准备。他先安排妻子李雪到苏格兰留学,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然后以李雪为主要申请人向加拿大当局申请技术移民。2002年,高山妻女定居温哥华。2004年10月1日李雪技术移民申请获批,高山一家三口随后获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但高山在作为附属申请人的移民申请中,刻意隐瞒了自己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行长这一重要身份信息,而仅填写自己在李东哲国内的公司任职。正是这个刻意的“隐瞒”,为高山的加拿大之旅埋下了隐患。出逃加拿大以后,高山深居简出,隐匿达两年之久,直到2006年10月的一场意外交通事故才暴露行踪。当时高山驾驶的蓝色马自达轿车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警察发现马自达司机并非车主本人,于是要求他提供个人资料,高山不得已报告了真实身份。2007年2月,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逮捕了高山夫妇,理由是高山的移民申请表职业资料填报不实,涉嫌持有犯罪所得资产,在中国国内案件中遭到通缉以及在加国从事洗钱活动等。

(一) 第一阶段:非法移民遣返

根据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的规定,如果有人在申请移民时对自己身份信息填报错误并误导移民官做出决定,移民与难民局可以吊销其移民资格。据此,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认定高山申请资料造假,隐瞒了自己身份,有误导移民官做决定的行为。如果查证属实,就可以吊销其移民资格,将其遣返回国。^[4]从2007年2月19日开始,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开始对高山的移民资格进行聆讯,3月6日、21日、22日又三次开庭聆讯。其中,在3月6日的聆讯中,案件发生了转折。在此之前聆讯的主题是高山是否具有合法移民的身份,而此次聆讯中,高山的律师沃尔德曼(Lorne Waldman)反诉加拿大难民与移民局滥用《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和程序。他认为,申请移民虚报资料并不至于造成遣返高山的严重后果,而且加拿大当局应当走刑

事嫌犯遣返程序，而不应利用高山在移民申请时填报不实资料为由将其遣返。这实际上也是遣返高山的另一个途径。此后，聆讯内容扩充为三项：一是指控移民当局滥用法律条文的聆讯，安排在3月21日及22日举行；二是高山移民申请时提供虚假资料的聆讯，安排在4月12日举行；三是指控高山涉嫌犯有经济罪行的聆讯，尚未定出最后日期。^[4]此后，移民与难民局对高山案又进行了多次聆讯。2008年4月，移民与难民局推翻高山“滥用司法程序”的反诉后，宣布聆讯基于“技术性问题”的需要改为闭门形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高山回国自首。^[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山提交移民申请时提供了虚假信息，但这不能否定他已经取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事实。所以，只有先依法吊销其永久居民身份，才可能将其遣返。高山及其律师在诉讼程序中，就是在千方百计地延缓遣返程序，如其律师反诉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滥用职权并应当按照刑事嫌犯遣返程序遣返高山。这两个要求都会导致诉讼程序的延缓：一是反诉移民与难民局滥用职权。此举在于通过指控移民局滥用职权，否定之前聆讯高山合法移民资格的正当性。而不论移民与难民局是否滥用职权，都已经成功地延缓了诉讼程序的开展。二是依照刑事程序遣返高山。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36条第1款规定了针对犯有严重犯罪者的刑事嫌犯遣返程序。^①根据该程序，如果有证据证明某人在加拿大以外实施了严重犯罪，该行为在加拿大也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刑罚，这些人是禁止入境应该被遣返的。毫无疑问，高山所犯的罪行在我国境内也构成了犯罪，根据加拿大刑法也属于应当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也就是说，除了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以外，加拿大还可以利用刑事嫌犯遣返程序遣返高山。但是此程序需要中方向加方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高山实施了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这些证据还需要得到加拿大司法机构的确认。^[4]相对于移民法中仅需要证明高山在申请移民中提供虚假资料而言，刑事程序对于证据的要求更高。而事实上，当时我国公安机关并没有掌握高山实施严重犯罪和转移资产的充足证据，若收集相关犯罪证据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真如高山及其律师所愿，从非法移民遣返程序转变为刑事嫌犯遣返程序，无疑又将诉讼程序的时间大大拉长。

（二）第二阶段：自首抑或劝返

1. 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对高山闭门聆讯以来的三种可能及其分析

在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将高山的聆讯改为闭门以来，我国国内媒体再没有关于高山聆讯的相关消息，直到2012年8月13日新华网发布“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高山回国投案自首”的报道。该报道除了明确“潜逃加拿大近八年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高山已于近期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外，还特别指出“多年来，公安机关锲而不舍，积极开展对高山等外逃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工作。在政策感召和法律威慑下，高山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6]。据此，我们可以对2008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间高山案的具体进展，根据高山是否被取消合法移民身份以及是否申请难民保护做出以下假设：第一，如果经过聆讯高山被取消移民资格，而且没有申请难民保护，其就会被强制遣返。第二，如果高山被取消移民资格并申请难民保护，移民与难民局就会启动“难民身份确认程序”。基于对移民和难民权益的保护，加拿大对于难民身份的确认规定了繁复的诉讼和救济程序^②，高山可以穷尽该程序，一直拖延遣返日期。如果被否定了难民身份，接下来要进行“遣返前的风险评估程序”，此时高山同样拥有足够的救济权。只要高山有足够经费支持，加拿大短期内恐怕还不能将其遣返。第三，如果高山没有被取消合法移民资格，或者还没有就其合

^① 实施了下列严重犯罪的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禁止入境：……（c）在加拿大之外实施的在犯罪地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在加拿大实施，根据议会法案构成最高刑期10年以上监禁之罪。

^② 有关加拿大难民身份的确认程序具体内容，请参见张磊《赖昌星遣返案的若干思考》，《刑法论丛》，2011年4卷。

法移民资格进行聆讯,根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加拿大是无法将其强制遣返的。

事实证明,第一种情况没有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高山虽然可能利用加拿大繁冗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拖延下去,但是很可能会重蹈邓心志、崔自力^①、曾汉林^②、赖昌星等人的覆辙,最终被遣返回国。在中加双方的强大压力下和多方因素的影响下,也不排除其自首回国的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高山具有合法移民身份,加拿大无法将其强制遣返,虽然也可能自首,但是可能性比第二种情况要小的多。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媒体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的猜测都有。如有媒体报道“李氏兄弟(指李东哲、李东虎兄弟,笔者注)的代表律师 Douglas Cannon 在就李氏兄弟案件回答问题时,提及高山已经在难民申请程序当中,由此证明高山已失去其加国永久移民资格,距离被遣返再进一步。”^[7]也有媒体报道,高山在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中认为自己“拥有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完全可以不回国自首”,“如果我不主动回来的话,加拿大也不会遣返我”^[8],说明其尚具有加拿大永久居住权。但是上述报道的真实性暂时都没有其他材料辅以印证,笔者无从判断。但是不论高山是否还具有加拿大合法移民身份,其自首回国的性质则是可以确定的。

2. 高山“投案自首”应当认定为“劝返”

作为引渡替代措施的劝返,本身包含自首的含义并且也应当被认定为自首^[3],所以高山“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到底是“劝返”,还是纯粹的刑法意义上的“自首”尚不得而知。其关键在于我方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是否直接接触高山并对其进行劝说。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我方劝说,高山不论是基于压力还是悔罪回国,都只能认定他为纯粹的刑法意义上的“自首”。如果是在我方劝说之下而自愿返回,则很可能构成“劝返”。我们认为,高山回国投案自首的情况完全符合劝返的对象、主体、依据、手段等特征。^{[9]176-177}第一,从对象上来说,高山是在我国实施重大经济犯罪后潜逃境外的犯罪分子。第二,从主体上来说,劝返由我国公安机关实施,他们代表国家而非个人与高山进行谈判。第三,从依据上来说,我公安机关劝返高山的依据是我国的政策和法律。第四,从手段上来说,高山是在政策的感召和法律的威慑下主动回国的,而不是被我国公安机关强行缉拿归案的。所以,虽然没有更多资料证实,但是根据媒体寥寥数语的报道,我们可以推断高山应当是“劝返”回来的。这种结论也被媒体的有关报道所印证(如果报道属实并且该报道所用“劝返”同引渡替代措施中的“劝返”含义相同的话)。^[5]

在现有的引渡替代措施中,劝返无疑是追回高山最为经济和有效的手段,不论对于我国、加拿大还是高山本人,都是上策:1)对于我国来说,劝返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境外追逃的经济代价,提高追逃的效率,而且可以彰显刑罚的及时性和必然性,鼓励更多潜逃者主动接受劝返。2)对于加拿大来说,在劝返中只需要被动配合,即可将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遣送出境,免去了在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诉累。3)对于高山来说,可以尽快结束在异域忐忑的流亡生活,基于“自首”而减轻刑事责任,得到真正的实惠。

① 2002年,邓心志、崔自力等人冒充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保险公司作废的保单签订保险合同,累计诈骗2400多万元后潜逃加拿大。2008年8月22日,邓心志被加拿大警方遣返回国,也成为首名因经济犯罪被加拿大遣返回国的犯罪嫌疑人。2010年1月13日,崔自力被加拿大警方遣返回国。2009年6月,邓心志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具体参见李松、黄洁《邓心志成因经济犯罪被加遣返第一人 骗2400万被判无期》,《法制日报》,2009年6月14日《崔自力被遣返回国》,http://www.cnr.cn/allnews/201001/t20100115_505898818.html.

② 1997年10月—1998年8月,曾汉林涉嫌重大合同诈骗犯罪并于案发前潜逃至加拿大。曾汉林潜逃后,我国公安机关坚持不懈地对其开展境外追逃工作,迅速向加方提出缉捕、遣返请求并及时提供曾汉林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2011年2月17日,曾汉林非法移民诉讼审理终结并被加拿大遣返回国。具体参见邹伟《经济案疑犯曾汉林潜逃加拿大12年被遣返回国》,http://news.sina.com.cn/c/2011-02-18/190721977702.shtml.

三、高山案和赖昌星案的异同

赖昌星是震惊中外的厦门特大走私案的首犯,1996年到1999年,他所领导的走私集团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10]1999年8月,赖昌星携家人出逃加拿大。2011年7月,经过中、加双方的不懈努力,赖昌星被遣返回国。^[11]2012年5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在一审宣判后没有提出上诉。该案不仅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而且因为赖昌星在境外潜逃12年之久,中、加两国为了遣返赖昌星付出了巨大努力而成为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历史上的成功范例。通过对比赖昌星案与高山案,我们可以发现两案有诸多的暗合与差异,所以对两案进行比较,从中总结推动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两案的暗合之处

高山案和赖昌星案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媒体将两者一再相提并论的原因。第一,高山和赖昌星都涉及腐败犯罪,然后出逃加拿大。从涉嫌的犯罪种类来说,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高山涉及挪用公款罪^[12],而赖昌星最后被判决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都涉及腐败犯罪;从出逃地点来说,两者都出逃加拿大。虽然有媒体报道,高山声称当时飞往加拿大仅想去探亲,买的是往返机票,还想要回来。到加拿大后才从李东哲处得知国内事情败露,已经回不去了。^[13]但这只是高山的一面之词。我们从他之前安排妻子去苏格兰读书,转移巨额财产并获取加拿大移民身份来看,他的出逃是蓄谋已久的。可能他的确购买了返程机票,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不具有潜逃意图,可能只是没有准确判断出逃日期而已。第二,两人在加拿大都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在此过程中,高、赖二人及其律师都利用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规定的繁琐程序,将诉讼程序一再拖延,滞留分别长达8年、12年。第三,两案都是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典型案例。因为两案诉讼程序非常相似,所以高山曾经和赖昌星沟通,希望借鉴赖氏的经验逃脱惩罚。^[14]也正因如此,赖昌星的遣返才会对高山带来巨大震动。甚至有观点认为,高山是在赖昌星的“带领”下回国自首,并不接受劝返的赖昌星费尽心机而依然被遣返回国,给高山造成一种警示。^[5]

(二) 两案的差异之点

两案虽有相似,但更多的还是差异,这也决定了对两人应采取不同的追逃措施及程序。

1. 出逃时的身份不同

2004年高山潜逃时已经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1999年8月赖昌星潜逃时只持有短期旅游签证,签证到期即转变为非法移民,加拿大有权将其驱逐出境。这也是2000年11月23日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以非法移民罪将赖昌星夫妇拘捕,准备作为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原因。由于出逃身份的不同,高、赖二人在加拿大所面临的诉讼程序也并不相同。

2. 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不同

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局针对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高山启动的是吊销移民身份的诉讼程序,而后才能以非法移民为由遣返高山。此时,如果高山提起难民申请,则根据情况陆续进入“难民身份确认程序”和“遣返前的风险评估程序”。而赖昌星在加拿大旅游签证到期之后,就已经是非法移民。由于其提起难民申请,直接进入了“难民身份确认程序”和后来的“遣返前的风险评估程序”。所以从进入加拿大的身份上来说,高山因为具有合法移民身份而比赖昌星安全得多;

从诉讼程序上来说,高山在完成“吊销合法移民身份”的诉讼程序以后才可能进行赖昌星所面临的诉讼程序。依此推断,如果一直走非法移民遣返程序,高山很可能比赖昌星在加拿大滞留更长时间。因为“高山在加拿大的官司从未输过,即使最终败诉,高山也有赖昌星的先例可循,走完加拿大法律程序至少是十几年以后的事”。^[5]正因为如此,高山在加拿大的8年经历,相比于赖昌星12年的潜逃生涯,似乎充斥着更多的扑朔迷离与交错暗流。^[14]

3. 回国的方式不同

如前文所述,高山是被“劝返”回国,而不是被遣返回国的。在有条件与加拿大当局周旋到底,无限拉长被遣返程序的背景下,高山能够自愿回国,是其在看到邓心志、崔自力、赖昌星等人被遣返后的明智之举,是“通盘考量”下的“最佳选择”。^[5]与高山的妥协相比,赖昌星是在顽固地走完了所有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经历与加拿大当局的12年博弈之后被强制遣返的。虽然在此期间赖昌星也曾经历思想转变而不再完全抵制遣返,但毕竟是非自愿回国。

四、高山案对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启示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警示未来。与赖昌星案相比,在诉讼程序上,高山案让中、加双方面临更为复杂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在处理结果上,高山案最终采取了更为经济、有效的劝返。这都说明高山案是近年来我国最为成功的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案例。那么,反思与总结该案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推动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

(一) 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高山最终被劝返回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加拿大非法移民程序的威慑。虽然高山及其律师一直在想尽办法拖延诉讼程序,但是加拿大当局将其遣返的决心是不变的。这也预示着,无论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多么繁冗拖沓,高山迟早是要被遣返回国的。这给高山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如高山回国后所说“坦白说我在国外的这几年生活的并不好,精神压力非常大”^[8]。第二,邓心志、赖昌星等人被遣返的影响。近年来,与高山一样出逃加拿大的邓心志、崔自力、曾汉林陆续被遣返回国,特别是赖昌星被遣返,同案犯李东哲自首^①都给高山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第三,邓心志、赖昌星等人回国后的待遇。邓心志、赖昌星等人被遣返后都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遭受酷刑、死刑,甚至还得到了宽大处理,如涉嫌诈骗2425万元的邓心志因为“具有自愿接受遣返及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15]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赖昌星数罪并罚仅被判处无期徒刑;涉案金额4.82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在与美国辩诉交易协议后被遣返,仅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②。这些人回国后,其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相反,拒不回国的余振东的同案犯许超凡、许国俊在美国分别

① 李东哲在2000年至2004年间,伙同高山等人采取不法手段,骗取多家受害单位的巨额资金。案发前,李东哲于2004年12月潜逃加拿大。2012年1月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具体参见史竞男、邹伟《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李东哲回国投案自首》,《人民日报》,2012年1月31日。

② 余振东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而后三人潜逃美国。2004年2月,余振东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受审,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判处144个月监禁。根据余振东与美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2006年3月3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余振东案的具体情况请参见《中行开平案主犯余振东一审被判处12年徒刑》,http://news.sohu.com/20060401/n242582495.shtml。

被判处了 25 年、22 年有期徒刑。^① 这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对于消除高山回国的后顾之忧起到重要作用。第四,我国司法机关的劝返工作。虽然加拿大一直积极遣返高山,但是我方并没有静观其变,而是努力开展劝返工作。媒体相关报道虽然简单,但已经反映出我方为劝返高山所做出的辛苦而细致的工作,这既向高山表明了我方追逃境外犯罪分子的坚强决心,又向其宣传了我方的宽大政策,对于推动高山回国自首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开展境外追逃过程当中,我们除了积极发挥追逃机关的主观能动性以外,还应当综合运用嫌疑人所在地国的法律制度和已经成功开展的追逃案例等多种因素,争取外逃人员主观上尽早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二) 我国境外追逃工作日趋完善

在引渡的替代措施当中,劝返不仅能为追逃国和所在地国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能减轻外逃人员的刑事责任,是最为经济、快捷、有效的引渡替代措施。在高山案中,高山在有条件将非法移民遣返程序拖延下去的情况下选择自愿回国自首,强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的有效性。在以往我国比较成功的追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为走投无路被强制遣返。如邓心志、崔自力、曾汉林、赖昌星都是中加合作强制遣返,余振东是由中美合作通过刑事法的替代措施遣返。^[16] 虽然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是被劝返的,所在国新加坡也没有强制遣返或者驱逐其出境,但胡星当时是在极其狼狈、别无他路的情况下被劝返的。^[17] 与上述案例相比,高山被“劝返”更反映出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日趋完善以及犯罪分子外逃空间的日渐式微。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在追逃中可首先考虑劝返,即使劝返不成,在实施移民法或者刑事法的替代措施时,也不能放弃劝返的可能性。因为在被非法移民遣返或者在异地被追诉刑事责任的时候,外逃人员极有可能迫于各种压力而接受劝返(高山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而提高“劝返”在追逃中使用的数量和频率,提高境外追逃效率。

(三) 继续开拓引渡合作的新领域

相对于非法移民遣返来说,劝返已经大大提前了高山回国的时间。但如果我们适用个案协议或者多边国际公约向加拿大提起引渡请求,高山回国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在赖昌星案件中,赖昌星出逃时间是 1999 年 8 月(加拿大新《引渡法》于 1999 年 6 月通过),当时正处于新旧引渡法的交替过程中,新出现的个案合作协议的制度并不为人所熟悉^[18] 并且当时加方已经启动了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再提起新的引渡程序在时间上并不合算^[19],所以中方就没有基于个案引渡协议提起引渡请求。如果说在该案中我方没有提出引渡请求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 2004 年底高山潜逃加拿大时,“新旧《引渡法》正处于新旧交替,新出现的个案合作协议的制度并不为人所熟悉”的情况,就不能再成为不提起引渡的理由了。而且,高山出逃时赖昌星案已在进行当中,我们应当总结该案的经验,对于高山依据“特定协议”或者依据 2005 年 12 月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加拿大均是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大大提前高山回国的时间。不仅如此,成功引渡高山也将充分体现我方在追逃中的主动性,开创中加引渡合作的先例。^[20]

(四) 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近年来,我国外逃贪官主要聚集在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已经成为中

^① 潜逃美国后,许国俊和许超凡分别于 2004 年 9 月、10 月在美国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落网。从 2005 年开始,中国公安部、司法部与美国方面协商对“两许”的遣返工作,但两人均不愿意接受余振东遣返模式。2006 年 1 月 31 日,美国司法部门以签证欺诈、洗钱、非法入境等 15 项罪名,对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共 5 人提起诉讼。2009 年 5 月 6 日,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以洗钱、跨州转运盗窃资金以及护照和签证欺诈等罪名判处许超凡入狱 25 年,许国俊入狱 22 年。二许被判刑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前中行主管许超凡、许国俊侵吞公款潜逃在美被判重刑》,http://news.sina.com.cn/c/2009-05-07/093317763834.shtml.

国腐败高官外逃的首选之地。以往, 我们和加拿大的追逃合作更多的是通过非法移民遣返、劝返等引渡的替代措施。而以赖昌星案、高山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成功的追逃案例, 反映出中、加两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空间将越来越大。两国之间在合作中建立的理解与互信, 已经成为以后合作的润滑剂。试想, 如果没有赖昌星等人的成功遣返, 加拿大方面针对高山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不可能毫无顾虑, 更不可能在我方劝返高山的时候坐视不管。而且, 在赖昌星案件之后, 中、加两国甚至为开始建立犯罪财产分享制度进行谈判并取得实质性进展。^[21]我们相信,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中、加两国的追逃、追赃合作会更加默契。借鉴中加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经验, 我们应当加强同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与更多国家建立良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关系, 开拓追逃、追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 [1] 黄风 《引渡问题研究》,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
- [2] 黄风等 《国际刑法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3] 张磊 《从胡星案看劝返》,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年2期。
- [4] 叶逗逗、黄运荣 《高山遣返案再起波折》,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704/03/t20070403_10919233.shtml, 2013年8月26日。
- [5] 汪峥 《高山回国自首之路》, 《新商务周刊》, 2012年3期。
- [6] 邹伟 《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高山回国投案自首》,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8/13/c_112712979.htm, 2013年8月26日。
- [7] 《高山移民身份已失去》, http://www.canachieve.com.cn/htmlDocument/2009-08-14/detail_70449.html, 2013年8月29日。
- [8] 张冲 《中行“高山案”开审高山自称绝对不是贪官》, <http://internal.dbw.cn/system/2013/09/30/055109852.shtml>, 2013年10月2日。
- [9] 陈雷 《反腐败国际合作理论与实务》,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年。
- [10] 廉颖婷 《媒体披露赖昌星在加拿大12年诉讼历程》, 《法制日报》, 2011年7月27日。
- [11] 黄晓南 《逃亡加拿大12年之久的赖昌星被押送遣返回中国》,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23/c_121710104.htm, 2013年8月29日。
- [12] 《“高山案”开庭前会议 被诉私自从银行转28.9亿》, 《羊城晚报》, 2013年8月20日。
- [13] 《高山案将审 律师称逃亡路始于揽储压力大》, <http://money.163.com/13/0819/15/96LD8T6N00253B0H.html>, 2013年8月29日。
- [14] 汪峥 《“隐者”高山》, 《新商务周刊》, 2012年3期。
- [15] 黄秀丽 《外逃加拿大经济嫌犯邓心志被轻判内幕》, 《南方周末》, 2009年11月20日。
- [16] 《余振东被判12年徒刑背后: 中方为将其遣返作承诺》, <http://news.163.com/06/0404/05/2DRDG3F20001124T.html>, 2013年8月29日。
- [17] 《胡星案: 跨国追逃成功范例》, 《检察日报》, 2008年1月8日。
- [18] 黄风 《境外追逃问题研究》, 黄风、赵琳娜主编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研究与文献》,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
- [19] 王彦钊、杨柳 《犯罪分子无论逃到哪里, 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检察日报》, 2011年7月23日。
- [20] 王君祥 《遣返抑或引渡——高山案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8年7期。
- [21] 龚向前 《中加将建立犯罪财产分享制度》, 《法制日报》, 2013年7月18日。

[责任编辑: 高 玥]

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he basic idea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doesn't catch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he conviction scopes and the conviction standards of certain crime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is not mature enough to benefit the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it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quir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whil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domestic objective situations is me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hinese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w

A Study of the Legal Issues of China's Overseas Pursuits from GAO Shan Case: Comparison with LAI Chang-xing Case

ZHANG Lei (87)

Abstract: Although GAO Shan experienced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process in Canada for a long period, he was finally persuaded to return to China. GAO Shan Case and LAI Chang-xing Case have some similarities, but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the two cases, such as, statuses in running away, suing procedures in Canada, and the ways of returning China, etc. We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GAO Shan's return, which showing that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is growing, but we still should open up new areas of extradi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with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Keywords: GAO Shan Case;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persuade to return; LAI Chang-xing Case; overseas pursuit

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U Ya-jun, YANG Jian (95)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explorative areas have existed.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good orde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od rul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Rules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sovereign state legislation, it can also be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The global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etermines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re convergence in probability. We need keep confidence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 make great effor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current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s well as to cautious to avoid extreme imbalance of benefits and to prevent the lack of relative fairness. With the new emerged international strong protection practic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need rational thinking and make good judgment and cope calmly.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rules 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Improvement of Non-Judicial Expert System in Chinese Criminal Prosecution

LONG Zong-zhi, SUN Mo-fei (102)

Abstract: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firstly established new expert institution besides judicial expertise institution, which is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of expert system. But there are some contradictions and omissions in the provisions which should be correcte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experts appear in court shall be termed as expert assessor in face of judicial appraisal items. But experts are permitted to support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opinion as a reference. The experts can act as expert witness when work on professional issues which are not judicial appraisal items. survey report supported from experts can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in trial. Avoidance system shouldn't apply to the Non-judicial experts. The expert eligibility shall be confirmed by court in concrete cases. The aspects of necessity of testifying at the trial include professional, significance and controvers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code which provid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expert shall apply to the Non-judicial experts". Avoidance system shouldn't apply to the Non-judicial